



生病的意义

□夏学杰

匈牙利作家马洛伊·山多尔说:生病就是休息。马洛伊·山多尔在《草叶集》一书中写道:在生活中无休止的竞争中,多数人只在生病时休息一会儿。生病,用法国诗人的话说,不仅是穷人的旅行,更是穷人的休闲,是冬季的维埃拉·塔特拉山,或是埃及。为迎合火热的气氛,疾病往往带来真正的发烧,以便让人稍事休息。胸怀大志或永不满足的人——比如诗人克莱斯特——“不断地辗转于城市之间,就像热病选择床榻”,他们只能在病床上思考真正的欲望和无法实现的激情。

作家就是作家,总是喜欢抒情,就连发烧在他笔下也变得不那么令人生厌了。事实上,发烧可是什么好事,人一发烧就头昏脑涨,连饭都吃不下了。正因如此,你要遵循大自然的指示,接受必不可少的病假,在你的生活节奏中插入一小段精妙的生病之旅,好好休息。有时即便健康状况极佳,也要在床上休整天。你会饿得胃抽筋,连钉子都不放过;自觉地饿上一两天吧。你的心脏不会因为尼古丁而抽搐;在自愿的情况下,远离香烟三天,对你有好处。最低限度地关注你的身体器官,这会让它相当放松!这些微妙的、完全自主的生病或痊愈的状态,自发的节食,完全抽离,好好休息的方式类似东方的传统,或是像进行了一次盲肠手术。试试看,你会发现这很神奇。

生病是休息,但是,前提是小病。正如鲁迅所言:“生一点病,的确也是一种福气。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要病是小病,并非什么霍乱吐泻,黑死病,或脑膜炎之类;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,不至于躺一天,就饿一天。这两者缺一,便是俗人,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。”

生了大病,那根本就不算是休息,而是遭罪。并且,就连感冒重的时候,也不是休息,而是痛苦的折磨。我觉得生病的意义在于报警。报什么警?——是不是平时饮食有问题,起居有问题,是不是工作过于劳累,是不是平时惯于生闷气……有些行为与习惯该改进了。生了胃病,以后就少吃生冷辛辣的;工作太拼,透支身体了,以后就悠着点,如抽烟就戒烟,如喝酒就戒酒。

我觉得,这是生病最近的意义。当然,人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,戒酒没几天,见病好了,就又猛喝起来。有时,不是烟酒难忌,也不是有些人天生就对烟酒上瘾,只是他们缺乏自控力。不怕你偶尔犯错,就怕你一错再错,一条道走到黑。

阿来说:“如果说生病有什么正面的意义,那就是让自己与好多无意义的事情隔绝了。可以静心读书,也可以让那些有意思的理念在心中生长。”

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。我觉得,生病的意义在于修整。检视错误,并思考:在自己的人生中,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《小窗幽记》言:“人在病中,百念灰冷。虽有富贵,欲享不可,反羡贫贱而健者。是故人能无事时常作病想,一切名利之心,自然扫去也。”

诚哉斯言!我已经历了好多回自己和家人的病痛折磨,自己深有感触。当生了重病之时,就会发觉,除了健康,什么都不重要了,因为其他都可以舍弃。只要有健康的身体,贫穷一点又有何关系,四处碰壁亦无妨。滴水都很难咽时,看到那些狼吞虎咽地吃着粗茶淡饭者,会艳羡得不得了,即便那些是你平日里很不愿意吃的粗茶淡饭。

父亲挑着柴火往前走,叫我跟上;跟着跟着,慢慢见不到父亲的背影了,我又停下来歇口气,趁机抽掉几根棍子,减轻一下重量,接着又去追赶上父亲。大概走了五、六里,父亲也在前面



扬州慢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因为一座城,你很想爱一个人。来到扬州,发现自己迟到了。要是再年轻一些,那一定要千方百计,想方设法到扬州来谈一场恋爱。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,神往的是可以享受美好温柔的扬州慢。

那天上午,慢悠悠地,从街头走到巷尾;下午,又慢悠悠地,从巷尾走到街头。一个适宜漫步,慢走,缓缓地看,细细地感觉的城市。不管你抬眼或低眉,左瞧或右望,入眼就见唐诗和宋词。

已经五月,仍是花开季,写了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李白早在千年前约我们春暖时分到扬州,阳历五月,也算农历三月吧。烟花五月下扬州,春花绚丽盛开时,濛濛细雨中,迷离烟雨间,宋人王观的《卜算子》浮上心头: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,欲问行人去那边?眉眼盈盈处。才始送春归,又送君归去。若到江南赶上春,千万和春住。”王观送友人鲍浩然到浙东的词,没写扬州,然而,也许有一句,“若到江南赶上春,千万和春住”,令人向往,到扬州遇上春天,一定要在扬州住下,从容地和春天面对面相见。

早上先在瘦西湖边散步。住在瘦西湖畔,出了大门,往左拐,直走,就见瘦西湖入门处的人潮一如

想象中的拥挤。大多是来自外地的游客。带我们的小鱼儿说。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下扬州”是个幻境,我们前一天坐车来的,身边也没多少钱。至于那些中国游客,腰袋里装的是手机,钱在支付宝里,付费都用现金。

到扬州大学正门口的柳湖茶坊喝早茶,一进门见座无空席,打破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广州和香港人才有饮早茶吃点心的习惯思维,原来扬州人的老话里早就有“早上皮包水”的享受。店里最著名的大煮干丝,少见多怪的南洋人以为是黄色面条,却是淮扬菜系中的看家菜。还有最具特色的蟹黄汤包,所谓的“皮包水”正是这一碗“轻提,慢慢移,先开窗,后喝汤”的汤包,每碗一个汤包配一个吸管,吃的时候先戳破汤包表皮,把饱含蟹黄和猪肉汁的鲜美汤水吸个闪光,就吃好了。因为汤水才是这道菜的主题,包子皮不吃。要吃包子,好客的吴教授点了大汤包、五丁包,芥菜包等共三种大包子,还有小汤包、牛肉、镇江肴肉、香菇、水饺等。其中五丁包为鸡丁、猪肉丁、虾仁丁、海参丁加笋丁,拌上卤汁,包在一起。据说当年日本天皇吃过后的评价为“天下一品”。

扬州的名菜还有苏东坡吃过后的评价为“天下一品”。扬州的名菜还有苏东坡吃过后的评价为“天下一品”。扬州的名菜还有苏东坡吃过后的评价为“天下一品”。

大呼“值那一死”的白烧河豚。清明节前吃刀鱼,刀鱼倒吃了,真是好吃。清明节后吃河豚。扬州人把刀鱼当“人间美味”,对河豚的赞誉是“人间至味”,更高一级,更胜一筹。“一朝食得河豚肉,终生不忘天下鱼”就是用来歌颂河豚的。中国古语“拼死吃河豚”意思是怀有剧毒的河豚,万处理不当,吃的人就要客死扬州了。唐朝诗人张祜来到扬州爱上扬州,爱得打算死在扬州:“十里长街市井连,月明桥上看神仙,人生只合扬州死,禅智山光好墓田。”诗是我写的,我也还想活着,活着再来看扬州,扬州只来一次,两次,那是不够的。

穿过扬州大学校园,回到酒店门口,领路的小鱼儿已在等待。随着她走进斜风细雨里,刻意不打伞,给自己制造浪漫感觉。扬州风光正是如此妩媚旖旎。瘦瘦的湖水在身边,翠绿的柳树在岸边。姹紫嫣红的鲜花在路边,湿润潮湿空气里有花香味。

邀请我们到扬州大学演讲的柏老师,带着我们行走扬州小巷子的小鱼儿,都不是真正的扬州当地人。然而,她们来到多江多河多湖多水的扬州,工作,住下,再也不愿走。作为游客的南洋人,对她们的热诚招待心存感激,但当我直接坦诚相告

我也不愿走,却不是为了附和她们,尤其人在市街闲逛时。

小鱼儿特别把我们带到“浮生记”。“浮生记”前屋和后院都只有两三张桌子,桌上摆着名片“四时读书好”。分明是家鼓励大家到此阅读的书店。进来的人不要带声音来,静静地拍照,店里的客人也没有声音,静静地读书。四墙摆满书,有站有躺,有直有斜,随意。问了一下,有供客人读,也有出售的。桌上摆一张写好字的纸:“细细刷牙,慢慢洗澡,好好睡觉,静静生活。”书法旁边有本书《席地而诗》,我说要买,员工说那是店主写的字,书也是店主自己保留,属非卖品。我要求拍照,员工说可以,只能拍照带走。照片一直拍到对面的“山有夏至店”,看起来像餐厅又像咖啡厅,砌着灰砖的外墙上贴有字:“我只记得梦开始时你的样子”,店家体贴地放一张木长椅,长椅旁是一棵小红枫叶树。结果经过的游人都在那儿摆姿势,每个人都想要记得梦开始时自己的样子吧。

这是一座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机会和唐诗宋词见面的城市,诗人说:“人生只爱扬州住,夹岸垂杨春气薰。自摘园花闲打扮,池边绿映水红裙。”人还没离开扬州,已经在梦想:什么时候再到扬州住几天。

童年的秋天

□陈雄昌

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,凉爽伴随着秋天来临,当闻着秋风带来泥土的气息,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。

晚风吹来,寂静、闲静、安静。我们来到大操场,躺在草地上仰望夜空,满天的星星镶嵌在空中,连眼都不眨,数了这遍,又数那遍,数也数不尽。童年的秋夜,天上的每颗星有一个童话,一个比一个神奇。

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晚上,金黄色的月亮挂在夜空中,特别大,特别圆。我们把在两天前就制作好的孔明灯,带到大操场放飞。这些孔明灯有大有小,用竹篾扎成圆架、方架,糊糊上柔韧的纸,灯笼底部横架的底盘上放置松脂,或用铁丝捆扎沾满豆油的布团。先点燃松脂或布团,灯笼内空气受热膨胀变轻,一放手,灯笼便冉冉上升,风向哪里就飘向哪里,宛如一盏盏明灯闪烁于夜空。

小伙伴们三五成群,相遇相聚,或安静地玩耍,或张狂地疯跑,打打闹闹,每天都过得很快。晚上,围坐在村里卖蔗地的两棵树下,或是墟廊的一角,轮流讲述新鲜的事儿,就像是在开故事会。

讲完故事后,接着就是捉迷藏。石头、剪刀、布,谁输了就自觉用双手捂着眼睛,转几圈,分不清方向,然后大家四处躲藏,远远地向这个“捉眼人”呼喊一声“好”,于是,捂眼人开始追捕,大家借着墟廊用煤油点着的几盏微弱的路灯东躲西藏。

墟里有人在院子里种上番石榴树,附近的涌基上也有番石榴树,在番石榴采摘的时候,就有大人小孩围着树下。番石榴(俗称鸡屎果)是一种常见的水果,味很好,甜津津水润润,口感嫩滑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田野里一片片金黄色的稻子,大地像铺上了一张很大的金黄色地毯。禾稻收割了,我和同龄的伙伴一样,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,就拿起篮子到田里拾稻穗,如果是星期天,我们就早早到田里去。在田里,我们看打过禾的“禾秆人”里边有没有藏着的稻穗,因为割下的禾把有长有短,虽然在禾桶打过了,也有漏打的。我们还跟在割禾打禾的阿叔阿姨后面,拾那些断落的一串半串稻穗。我们把拾到的稻穗用竹篾窝或藤窝放在门口晒干,用手搓脱出谷子。拾到的稻穗,集腋成裘,一箩半箩,再拿到粮食碾米厂碾米。

秋风送来一阵阵浓郁的桂花香,我仿佛找回了远去的童年秋天。

东湖旅店

□陈雪

东湖旅店前身不叫东湖旅店,而是惠州绅士翟雨亭的私人别墅。这座建于1935年的欧式建筑雄踞于繁华的东平大街之上,在一溜排的骑楼中间醒目地矗立着。高大的门面,宽阔的开间,幽静的花园和别具异域风格的豪华装饰,充分显示出主人的殷实和品位。即使是在今天看来,处在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它,仍然不觉得落伍。

这位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翟雨亭先生,曾有一个庞大的实业报国计划,他在创办建筑公司,参与惠樟公路修建的同时,还想建设一大批经典建筑,作为西湖的配套景点,来点缀装扮这座古城。1938年,日本侵略者攻占惠州后,桥东木楼在火海中三日不灭,唯有这座钢筋水泥的建筑,劫后余生地耸立在东平大街上。

惠州城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,又是东江流域繁华的商贸之地。东湖旅店毗邻临街,水陆便利,实为黄金地带。我们尽可以想象,70多年前的桥东大街是何等盛景:骑楼鳞次栉比,商号依次排列;街市上行人熙攘,店家酒旗飘扬。身着长袍大袖,峨冠博带的商贸大亨,一身短衫的手挑夫,在小贩的叫卖声中,步履匆匆;码头上货物成山,人来人往;江上帆船林立,舟楫相接。一到夜晚,桅灯高照,水上千户人家,岸上万家灯火,涛声、人声交织相映,那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清明上河图……可惜的是,日本侵略者一把大火把这幅“上河图”烧得干疮百孔,也把翟雨亭酝酿已久的建设蓝图烧成灰烬。当他把这座别具一格的欧式建筑改成东湖旅店之后,他一定没有想到,小小的一家旅馆,会与中国抗战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抢救行动结下不解之缘。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坚持了十八天的香港保卫战以失败告终。当港督黎敦义向日本侵略者降下白旗时,香港不再是“东方之珠”。党中央、南方局一直在关注着香港战局和在港的民主人士的安危。一封封加急电报,从延安、重庆不断地打到香港皇后大道五号,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南方工委的缜密部署下,一场抢救文化人的大行动,旋即在港澳地区全面展开。

四条转移路线,两条跨海,两条水陆并举。由于日军控制了海域和渡船,八路军办事处与广东地方党组织选来选去,都只有选择东江经过惠州这条线路最为稳妥。虽然这条线路最长,关卡最多,日、伪、顽、匪最集中,但经廖承志、连贯、乔冠华实地考察,这条线路的有利条件也不少:一有健全的地下党组织,二有东江游击队的坚强武装,三有良好的统战工作基础。最危险也最安全,虎口拔牙,将计就计,租下东湖旅店这个要塞之地作为秘密中转站。

于是,地下党员卢伟如作为香港昌业公司老板的身份,住进了东湖旅店;廖安祥带着廖承志的密令来惠州开办“源吉行”,秘密协助卢伟如开展工作。从1942年1月初开始,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妇、胡绳夫妇、戈宝权等20余人在1942年的除夕夜,来到东湖旅店,接着是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、第五批,邹韬奋是最后一位来到惠州的贵客,国民党在通缉令中申明:“可就地惩处”。惠州地方党组织、东江游击队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,为他改名李尚清,由陈永及卢伟如的妻子陪伴他“早出晚归”,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捕和追杀。

短短的几个月,200余位文化名人从宝安白石龙来到惠州,在东湖旅店秘密中转,再沿江北上,陆续转至大后方。一段艰难而惊险的经历,让一大批文化名人写下了诸多的回忆录。

东湖旅店历经了七十多年的风雨岁月,没有苍老,历久弥新。尽管水东街今日的风物楼宇,已与当年殊异,但流淌的江水仍然有一条写满记忆的河床,泛起的浪花正是永沉寂、脉脉跳动的红色基因,这曲生命的礼赞早已融入进了共和国七十年华诞的雄浑旋律之中。

父亲的钎担

□杨德振

停下来歇气,顺便等我,见到我满脸通红、大汗淋漓,父亲递过来已是湿透了的白大布毛巾,让我擦把汗。擦完汗,我再细看父亲的钎担上,一头大概有一百多斤一捆的柴火,两边加起来,起码有二百六十多斤。他起身挑起来的时候,只见钎担两头朝下耷,发出“吱、吱”声,走起路来时,“吱吱嘎嘎”响个不停,韵律感十足。

我跟在后头,也想找到“吱吱嘎嘎”韵律感,无奈我的钎担硬邦邦的,发不出任何声响,步履也找不到节奏。直到现在,我才明白,挑的东西太轻,钎担是“不高兴”的,它是不会唱歌的。父亲能够让钎担“唱歌”,唱的是负重之歌,也是一家人的“希望之歌”、“幸福之歌”。

在蜿蜒崎岖山路上跟着跟着,我又渐渐看不见父亲的背影了,害怕,疲倦和无助一齐袭来,我陡然啜泣起来……在荒野里哭泣没人理,也没有用,除了几只乌鸦在树梢上“看热闹”叫个不停外,还有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凄厉风声。这个时候,我对钎担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和恨意,怪父亲把钎担做得这么“硬朗”、“结实”、“沉得”使我白嫩的双肩像擦了红汞似的,一阵又一阵地发烫。在离村子还有五里的地方,爷爷突然出现了,他是专门来接我的。回到家中,爷爷用秤一称柴火,还有48斤;如果加上钎担重量,就有六十多斤了;如果不是在路上“卸负”,恐怕整担柴火七八十斤重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,已经能够轻车熟路地使用钎担了,也能够像父亲一样上山砍柴,挑一两百斤的柴火。作为家中老大,我用钎担承担了父亲的一部分责任。高一、高二读书期间,我的学费和给学校上交的每学期380斤柴火任务,都是我自己用钎担完成的,没有给父亲和家庭加重负担;那时候,一百斤活柴挑走三十里路卖九角钱……

如今细想,我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正是那时用钎担“挑”出来的吗?没有钎担的“压榨”与磨砺,没有钎担的“鞭策”与敲打,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。从这一点出发,我要感谢严厉的父亲!还要感谢“沉默无言”的钎担!



珠竹生辉(国画)

□徐海燕